



## 从“种”到“收”说花生

◎陆遥

花生耐旱且产量高,因而多年来种花生一直是我家的主打产品。每年“五一”节前后,贤惠的妻子便拿出春节期间已精挑细选剥好的花生种子放在太阳下暴晒。我家的花生品种有五六种,不仅有黑花生,有花生籽长溜溜淡红的粗角子和中角子,还有适宜春节炒着吃、香得打嘴也不放的细角子等等。

待这些饱满的种子暴晒两天后,妻子便利用下班间隙在田里摆开了阵。开行、下肥、播种,一连数天后,不同品种的花生下了地。为防止杂草影响出苗,妻子又在花生地里喷上除草剂。此外,妻子还在田间插上一面面小旗,以防鸟类等糟蹋花生种子。

十多天后,花生地里的泥土渐渐隆起,并裂出一道道缝隙,一根根嫩嫩的花生茎破土而出。不几天,从绿色的茎干中又生出两片鹅黄的叶片,就像婴儿的手掌。随着雨水的滋润和肥力作用,花生苗铆着劲似的往上长,一棵棵匍匐在田间的花生由黄变绿,伸出的茎干“噌噌噌”地往四周延伸。这个时候,杂草又不失时机地探出头来,和花生分食营养,妻子再次下田开几个早晚工,将杂草全部清除,然后再追施一遍肥料。

七月流火,花生地里呈现出一片绿色海洋,一棵棵长满叶片的花生藤上缀满了鲜亮的小黄花。在晶莹剔透的露珠的映照下,开得那么鲜艳和亮丽,成了田野里的一道独特风景。

我这个土生土长的农村人对花生情有独钟。小时候,家里穷得叮当响。白天忙完生产队劳动的母亲晚上带着我们几个子女做芦花鞋,以贴补家用。深夜时分,我们困得睁不开眼,且又冷又饿。这时母亲便说,你们加紧做,等做完我给你们炒花生。虽然我们知道家里仅有的一点花生是留着过年和送亲友的,但还是被母亲这善意的谎言吊起了胃口,又不停地忙乎起来。

暑气逐渐止,秋雨凉风至。立秋以后,绿得耀眼的花生叶开始泛黄。秋风吹过,送来缕缕芳香。这时候是尝鲜花生的最美季节。来到花生地里,随意拽上几棵,随着泥土开裂声响,只见花生根下那蜘蛛网般的茎干上缀满了白白胖胖的花生果。抓住茎干,轻轻一抖,裹在花生果上的泥土簌簌掉落。粗略一数,每棵花生藤上竟有数十角花生。摘下洗净,加水放盐煮熟,一家人围在一起吃得津津有味,唇齿留香。

国庆节前后,经历了春夏秋孕育的花生到了收获的季节。家家户户,男女老幼齐上阵。放眼田野,花生地里到处晃动着人影,有的弯着腰,用刀挖或用手拔着花生藤,有的或蹲或坐在小凳上摘着花生果,还有的铺条被单,抓着花生藤在凳子上使劲甩着。尽管累得腰酸背痛,但当一筐筐散发着泥土芬芳的花生果被运回家时,整个田头不时被那洋溢着丰收喜悦的笑声包围。

我家收花生和别人家不同,都是用手摘的。下了班的我和妻子趁着天尚未放黑,麻利地将花生藤拔回家,然后在晚上点上蚊香,拉亮电灯,伴着秋虫的低吟浅唱,左手抓藤,右手摘角。用手一角角摘,速度虽慢了一点,但可将嫩的花生果剔除,还可避免花生茎、叶混在一起。不管忙到多晚,我和妻子都要将摘下的花生果用尼龙网袋装着到河里洗净,然后均匀地铺在桁上,让其沥水,等着天明太阳的光顾。经过几天的暴晒,我家晒干后的花生洁白如玉,角角饱满。

人勤地不懒,种地苦也甜。我们在这块希望的田野上迎接诗和远方。

## 高高盐坨不息河

◎林炳堂

“陆输车轧轧,水运舟尾尾”,这是元代诗人沈梦麟在《余中》一诗中对当时盐运场景的描述。包场作为通东地区重要的盐业集散地,高高盐坨不息河,繁忙而沉重的盐运场景,我听老辈讲述过,儿时也依稀有记忆。

据海门县志记载,北宋年间,县境东部沿海地区已有煮盐,盐丁大多为被流放的囚犯。至清中叶,内地破产农民陆续迁居盐区。清嘉庆年间,盐区称余东场,为淮南十盐场之一。清中后期随着泥沙沉积,海势东移,原来中部的产盐地由石港场、西亭场、金沙场逐年东移,集中到了余西场、余东场。嘉庆七年(1802)余东场产盐达6727.5吨(《海门传》111页),仅次于吕四场。这期间,包场老皇岸8里外的沿海就布满了盐灶,有大东灶、小东灶、御东灶、八甲灶、御西灶、余灶、沈灶、李灶、王灶、沙图灶十灶,归余东场管辖。繁盛时,有墩100多个,盐丁600多人。“烟火三百里,灶煎满天星”是当时盐区的真实写照。

紧靠沿海盐区的包场,不少穷苦农民为生活所迫,纷纷来到海边,搭起环筒舍,从事煮盐的艰苦劳作。灶民处于社会最底层,常年遭受风吹日晒火烤和海水的腐蚀,蓬头赤脚,手足破裂,被人称为“灶蛮侯”。他们的生活正如清代《煎盐绝句》所描述的那样:“白头灶户低草房,六月煎盐烈火旁。走出门前炎日里,偷闲一刻是乘凉。”到民国十年,盐区有灶户4700多户,盐丁1.7万多人,年产原盐达500吨左右。真可谓“穷奔沙滩富奔城”。

沿海煎盐业的兴起,催生了盐商的进入。包场因紧靠盐区,又有老运盐河贯通,盐商首先选中这里作为经营之地。清咸丰年间,镇江人捷足先登,在包场镇开设了颜德泰盐店、义记盐店。颜德泰盐店位于镇东首,称之为东盐店。义记盐店位于镇西首,称之为西盐店。随后又有广东人闻风而至,开设了德长厚盐店。德长厚盐店实力雄厚,兴盛时拥有亭309个、堰地20处、包房11处、官蓬1个、店房56间、灶公所4处15间、草地12100亩(见《大生集团档案资料》之八),其规模在余东场诸盐商中领先。进入包场的这些盐商均系私商集资经营,专门

收购附近盐区所产之盐,然后通过老运盐河再营销各地,从中获取利润。

盐业的发展也催生了盐运的兴起。包场镇紧靠老运盐河,水运十分便利,镇后又有广阔的场地,便于盐的集中和堆放,实力雄厚的德长厚又驻在这里,因此,包场就成为盐业集散中心。盐商首先要从沿海灶民处收运食盐,运抵包场盐坨。这段路程的运输靠的是牛车,当地人称之为“高车”。牛车的车身用硬质木料制成,一般为两轮车,轮的直径为一米左右,大的一米以上;也有四轮车,由两头牛牵拉前进。两轮牛车可载重一吨左右,四轮牛车可载重一吨半至两吨。牛脖子上都架有一块三角形木架,叫作“独牛”,两端系上麻绳,用作牵拉后面的车。由于牛车具有较强的拉力和耐力,装载量大,它能走过坑坑洼洼的烂泥地,又能穿过淤积的滩涂草荡,还能淌过浅水沟和小河,很适应盐区的运输,起到了其他运输工具不可替代的作用。从堤北盐区到包场镇有七八里路,装运盐就靠这牛车。每天早晨,一驾驾牛车从盐区驮着满满的、洁白的盐,发出“轧轧”的响声,迈过坎坷泥泞的滩涂,翻过高高耸立的老皇岸,来到盐包场集结,包装、过秤、搬运、上堆。卸完盐后,主人就牵着牛来到附近的“牛屯沟”洗澡饮水歇息。十几条牛聚集沟里洗澡饮水,是盐区的独有风景。

从包场发往外地的盐,靠的是水运。老运盐河就在镇边,运输十分方便。运盐的大多是木帆船,每只船可装15吨左右。每逢装船,盐工肩扛盐包,踩着悠长的跳板,喊着粗犷的盐工号子,把一个个盐包装运上船。起运时,运盐河上满载食盐的船只首尾相接,排成长长一队,浩浩荡荡地开往通州、扬州等地。包场附近的一些农民看好盐运,便纷纷购买木船,从事起盐运业,附近村曾拥有木帆船100余艘。

俗话说,世上三桩苦,航船、打铁、磨豆腐。水上盐运十分艰辛,航行动力全靠风帆和人工背纤。航船人常常是日夜兼程、风餐露宿,被称作“船蛮子”。这些船在运盐返回时,常把外地的一些农副特产捎来本地,如水芹、河藕以及扬州、通州的南北

货等,极大地丰富了本地商品供应,活跃了市场。一些较大的盐商还在镇上建起了市房、会馆和寺庙。

到了清朝末年,因淮北盐场兴起,其所产的晒盐“比诸通泰如各场煎盐费省至1与15元之差”。当时淮南所产之盐均为煎盐,成本高、盈利低。“于是产盐趋于淮北,而淮南煎盐业渐次衰落”。受此冲击,余中场的两家盐商德长厚和积丰顺“以困弱之力无力继续”,又因“欠交官款无以出”,于是“愿尽卖其垣产”以脱困境。

1913年春,张謇与三五同人集合资本10万元,购买了德长厚、积丰顺垣产和荡地,开办盐业,兼事拓植,创立大有晋盐业公司。不逾月,又有余西场裕和祥垣商并归,以及金陵公荡4090亩地作价入股,便把股本增至50万元,公司也由原来的合资公司改为股份公司。经对包场德长厚店房整修、扩建,设立大有晋盐业分部,全面负责经营亭灶、煎制、收运、销售、垣盐等事务。公司前辟有一块广阔的堆盐场地,俗称“盐包场”。广场上耸立着高高的盐坨,蔚为壮观。三垣归一后,大有晋盐业取得长足发展。据大有晋公司账略统计,最多的年份进款近10万元,盈利达13000多元。此时,盐包场上盐坨高耸,运盐河上舟楫往返不息,真是“陆输车轧轧,水运舟尾尾”,大有晋盐业几乎到达顶峰阶段。

1938年4月后,大有晋公司迁沪办公。1940年10月,新四军东进后,接管了各旧式盐务管理机构,随后将包场堤北沿海的十灶合并成五灶,隶属余丰盐场(总场)余中办事处管辖。日寇侵占包场后,余中办事处领导灶民成立“盐抗会”,与敌人展开抗捐抗税斗争。1951年,包场镇为余中场务所驻地,后改为包场盐务所,主管盐区的盐政和盐税。1952年,国家对食盐实行专卖。1954年,包场盐坨迁往东兴闸外坨地。1958年10月,在原盐区建成700公顷盐滩,成立了海门县国营盐场。此时包场镇盐业集散中心的功能逐渐消退,就难见“车轧轧、舟尾尾”的场景了,而高高盐坨不息河则牢牢镌刻在包场人的记忆里。

